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3.007

《老无所依》与《基列家书》的 老年模态与西部精神重构

胡碧媛

(河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美国作家科马克·麦卡锡与玛丽莲·罗宾逊于新世纪分别推出老年身份书写小说《老无所依》与《基列家书》。前者重在对资本逻辑摧毁传统文化价值的批判,而后者重在权力话语的领域性建构,两者均以老年主体经验为文学再现的路径,旨在突破西部青年神话的物质经验,用以保守精神与价值坚守为核心的老年模态重构当代西部文化内涵。

关键词:科马克·麦卡锡;玛丽莲·罗宾逊;《老无所依》;《基列家书》;老年模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3-0062-06

在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及文学阐释的视野中,“关于特定文化或是历史阶段的社会分层分类(包括种族、性别、阶层、年龄),只有年龄处于鲜有研究的隐形状态”^①。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西部文学创作及批评范式却对年龄景观给予重点关注,尤其是经历“旧西部”向“新西部”再到“后现代的西部”的两次文化转向后,创作主题逐步从西部青年神话向老年模态再现过渡,在学界“厌老症”(gerontophobia)的现状下有力发声。

在此背景之下,美国西部文学重量级作家麦卡锡于新世纪伊始出版了小说《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an*, 2005),将身份政治的关注视野转向老年化存在。无独有偶,偏爱中西部文化状况书写的美国当代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于2004年出版《基列家书》(*Gilead*, 2004),也开始了以老年身份为表征的知识精神写作。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有华莱士·斯特格纳、肯特·哈鲁夫等西部作家分别出版《休眠角》(*Angle of*

Repose, 1971)、《绑定的结》(*The Tie that Binds*, 1984)等老年题材小说。戴维·里奥认为这几部作品的“老年转向”,表明西部文学脱离传统边疆精神的青年隐喻,呈现了“老龄化、灰色、病态的西部”^②。该文在分析青年神话的文化谱系之后,转向非虚构文本的老年书写研究,并未对上述虚构文本进行深入阐释。詹姆斯·伍德认为玛丽莲·罗宾逊的“早期作品中有许许多多仿佛由热衷古文的科马克·麦卡锡写出的时刻”^③,两者创作风格具有相似性,且在一定程度上顺应西部文学创作的趋势。连续两年分别推出关注老年身份的小说,这无疑为两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然而问题在于,是否如戴维·里奥所言,学界普遍认为具有人文情怀的麦卡锡和罗宾逊的现代书写也开始哀叹西部的末世衰落?是主题的变化或是文学风格的变异?两位作家如何再现西部的地域性与老年身份之间的关系?

美国西部文学协会于1987年出版重量级著

收稿日期:2019-11-02

基金项目: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18YJA752004);2018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WXB005)

作者简介:胡碧媛(1971—),女,江苏南京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① Kathleen W. “Simone de Beauvoir: Aging and Its Discontents”, In Shari B, ed. *The Private Sel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omen'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p. 90.

② David R. “Facing Old Age and Searching for Regeneration in a Dying American West: Gregory Martin's ‘Mountain City’”, *Atlantis*, 2016 (1), p. 149.

③ 詹姆斯·伍德:《私货》,冯晓初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

作《美国西部文学史》,“以地域性而非民族性”^①视野奠定西部文学研究范式。聚焦西部征服史的经典历史著作《征服的遗产》亦于同年问世,其作者帕特里夏·纳尔逊·利默里克提出,西部作为欧裔征服的领土具有独特的经济价值而非民主机遇。可见,地区性和领土性在西部文学范式建构的初期就标志为基本文化属性。本文试图以此为研究路径,以文化研究的领域性(territoriality)为切入点,阐释两位西部文学重要作家新世纪小说的老年叙事特征,探讨老年模态的西部景观,进而延伸至西部文学的历史意识与文化生产等问题的思考。

一 身体实践的心理转向

《基列家书》与《老无所依》都有着相对简单的情节线。前者着眼于特纳所言的介于“(西部)边疆与(东部)定居点”之间^②的过渡边境——1950年代的中西部,小说为公理会牧师埃姆斯在垂暮之年给儿子书信写就的回忆录,以独白方式展现家园、种族、信仰、伦理等思考,绘制宗教精神生活中的西部历史与文化景观。《老无所依》的背景则设置在1980年代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交界的西南边境,电焊工摩斯在打猎的旷野无意间闯入贩毒黑帮的火拼现场,将毒资据为己有,从此开始亡命天涯,并最终死于赏金杀手齐格的枪下。小说的线性叙事主线——摩斯的逃亡、齐格的追杀、警长贝尔的调查追踪——结合贝尔意识流回忆的双重模式,生动再现麦卡锡的暴力边疆。从身份政治的角度而言,两部作品的叙事焦点都在于老年身份与西部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年龄身份指的是人随着年龄增长的主体经验^③,这种经验涉及身体的物质经验与心理的主观经验两个维度,反映人在老龄化过程中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人作为主体的影响力与控制力的感知与调整,即人类学的领域性认知。

人类的领域性是“通过声称或是试图施加控

制力于某一地理区域,尝试干预、影响、控制人类或是物体的行为和关系”^④,这个定义所阐释的人类领域性关键词包括区域、控制、行动及关系,也就是人类主体对于特定区域内客体的控制与影响,其传递媒介为行为方式。人类的行动力以身体为基本物质条件,而衰老过程直接表现为个体生理功能退化以致行动力减弱,埃姆斯牧师在几近耄耋之年则首先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埃姆斯牧师终其一生都在基列小镇度过,每天固守于教堂布道和居家阅读写作的规律日常,他罹患严重的心脏病,每日的宗教冥思更多沉浸于生存死亡的人类终极命题。人文地理学视域下的身体是个体空间化的位置与场所,身体的行动力以物质空间的转换和流动建构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赋予主体定位感及时间化的存在意义,同时使主体对空间产生情感依赖。对于埃姆斯来说,基列一生的身体在行动范围上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家园的情感经验赋予他充沛的安全感,“我说‘这个破破烂烂的老镇’,意思是,他们和我的心贴得很近”^⑤。这种亲近感从主体性来说意味着主体对环境的控制力,即领域性的建立。原本与环境发生直接关系的身体行动,作为一种物质实践已经转化为主观性的心理感受,在身体实践退化的情境下,依然在心理与精神层面赋予主体稳定的领域把握,如埃姆斯所思,“‘老’实际上和年纪关系不大,倒是和熟悉程度的关系很大”。

罗宾逊研究学者坦纳利用神经科学的视野阐释埃姆斯老年身体实践的细腻感性体验,认为老年生理健康的退化以及心理层面的死亡焦虑令埃姆斯“试图通过感知聚焦补偿可预见的巨大丧失”^⑥,也就是说,老年生理功能的衰退反而伴随着感知功能的强化。社会心理学研究则从主观经验层面建构老年人的“非年龄化自我”(ageless self),通俗而言就是老年人总感觉自己年轻(feeling young),而且比同龄人状态良好,“老年人

①Nina B. “Old West, New West, Postwest, Real West”.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006 (4), p. 814.

②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美国边疆论》,董敏,胡晓凯译,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③Gerben J W. “Age Identity”, In Deborah S C, etc., eds. *Encyclopedia of the Life Course and Human Development, Volume 3*,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9, p. 10.

④Robert D S. “Human Territoriality: A Theor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3(1), p. 55.

⑤玛里琳·鲁宾逊:《基列家书》,李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不再另注)

⑥Laura E T. “‘Looking Back from the Grave’: Sensory Perception and the Anticipation of Absence in Marilynne Robinson’s *Gilea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07 (2), p. 231.

相信老龄化意味着退化,但他们自己都是特例”^①。埃姆斯虽然一直声称年老,但这种话语游戏并不完全代表他真实的主观感觉。“作为将死之人,我的自我感觉相当好”,他对自己的身体抱有年轻化审美的自足,认为自己毛发浓密均匀,白得“好看”,保留着年轻人的强壮旺盛,“我知道从外表看,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个很说得过去的老家伙”。就客观环境而论,他的内心洋溢着对年青的赞赏,“我在大街上从两个年轻人身边走过……不时发出令人讨厌的刺耳的笑声。可是我听起来那声音也很美”。他在古稀之年生下幼儿,以丰沛的生命意识充实伦理向善的精神世界,在日常生活中以坦纳论述的“强化感知”时刻捕捉、体会、感受生命存在的活力,“阳光下小孩儿的头发闪着微光……所有这一切自然都很好,但我主要爱你的存在”。小说更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描绘埃姆斯对洗礼投入的极大热忱,仪式化的身体实践强化埃姆斯生命意识的同时,也在心理层面增强老牧师自我存在与现实控制力的主观体验,“这个年老的躯体就像你一样,依然是一个全新的创造物”。

不可否认的是,埃姆斯的年轻追求是一种精神崇高,从人类的生物属性而言,精神追求依托的依然是一个物质化、世俗化、充满欲望的身体,“事实上我不想老,当然更不想死……我迫切地希望你在我年轻的时候认识我,倒也不必真的年轻。六十岁认识我就行,我身强力壮……就是现在心脏没问题,我依然可以做很多事情”。埃姆斯生命意识的坚强动力在于对现实继续施予行动、控制、影响的渴望,这种控制力所创造的生存感和安全感,更体现在领域性关键词的“关系”方面。

二 流动资本的身体驯化

《老无所依》所再现的德克萨斯与墨西哥边境,褪去了昔日西部神话笼罩下的希望之光,从人与自然的角逐转向资本逻辑的社会建构,呈现的是掠夺自然的资本景观。贝尔的警长身份俨然为国家机器的象征,这一社会性职责具有强烈的领域性特征。他所控制和管辖的西南边境,充满经济、政治及文化性符号。贝尔从年轻时代起就坚

信责任、伦理等保守型价值观,极力维护维持生命存在的社会秩序。贝尔终其一生以人文化理念实施领域管辖,身为国家机器执行者的贝尔也常常为此彷徨无措。针对身体的暴力作为权力控制的实施手段,充斥于西部征服史,而贝尔在即将退休之年才第一次将一位年轻人送进毒气室执行死刑,也是他从业几十年唯一的一次,小说的开篇即以贝尔的内心独白表达对暴力和生命凋零的无奈和绝望。“一个连他本人都承认自己没有灵魂的人”^②,“他告诉我,从差不多能够记事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盘算着要把谁弄死”。旧西部意象中充满希望与生命活力的年轻意象,在麦卡锡的文本空间改写为被抽空了情感意识、充满毁灭欲望的空洞身体,这个身体因灵魂的缺失无视规则秩序,也难以逃脱权力的规训。贝尔的精神空间保持着对年青神话积极的肯定,但是身体的行动力却不得不针对现代性改写的年轻身体,这种老年与青年的空间与时间错位再现了西部文化流变的伦理危机。

西南边境活跃的毒品贸易依赖于流动性和地理空间的转移而创造资本的价值,这其中伴随着地理边界的跨越而导致政治与文化边界的侵犯、藐视直至区域性消融。小说的逃亡与追逐路线沿着德克萨斯西南斯托克顿堡——桑德森——德里奥——墨西哥彼得拉斯内格拉斯等紧邻边境的一系列市镇展开,沿途的暴力、枪战、屠杀将身体作为对象进行酷刑般的惩罚与公共展示。尸体的位置与形态、血迹的颜色和性状、枪支的技术性参数、车辆的型号等身体、知识与流动性符号,融合装有无线电定位器的美钞皮箱、鳄鱼皮鞋等消费元素,嵌入田野、荒漠、山脊、灌木、岩石、甘蔗丛、莫哈维响尾蛇等自然景观之中,文本细节的堆砌创造具有冲击性视觉效果仪式感。在追逐摩斯和齐格的过程中,贝尔一次次被呈现身体的酷刑仪式,原本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之下隶属规训机制的贝尔,被动成为酷刑的观看对象,即暴力规训的对象,麦卡锡再次以这种征服与被征服错位的文本话语勾勒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部机制。

与贝尔一样,摩斯显然也沦为身体酷刑展示

^①Gerben JW. “Age Identity”, In Deborah S C, etc., eds. *Encyclopedia of the Life Course and Human Development*, Volume 3,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9, p. 11.

^②科马克·麦卡锡:《老无所依》,曹元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不再另注)

的对象。人文地理学家爱德华·凯斯从身体的本体论视角建构人类的身份地理观,认为身体的空间位置、行动的方向性、活动维度使主体感知“身体定位性(corporeally localized situatedness)”,特别强调“身体作为方向性的功能”从而建构个体生存的物质实在性^①。摩斯在西南景观旧有机制中的定位,因资本从“远域”(far sphere)向“近域”(near sphere)的跨界流动具备的“触及感”(reachability)而发生了改变,“近域”的身体经验传达领域内控制力的信息,激发摩斯的占有欲望。殊不知,这种资本流动为新机制的出现创造可能,摩斯认知主体的领域性掌控力实则内化为身体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驯化过程,并被改造、利用为新机制的生产工具。摩斯的身体规训与感知错觉的二元化经验,再现了旧西部机制瓦解过程中年轻神话的破灭;反之,贝尔面临新机制则试图做出种种适应性抵抗。年龄身份理论认为,人会根据个体老龄化发展程度做出两种倾向性的改变:努力克服年龄增长所带来的局限性而尽力维持习惯,或是改变习惯创造与年龄匹配的新常态^②。贝尔感慨“江河日下”的时局,“老一辈警长们对自己管辖下的人民曾经具有的那些传统情感,基本上已经淡化了”,困惑于机制突变的权力关系悖论,“想想看,一项工作,拥有和上帝一样多的权力,却又有什么法规约束,还得负责保护一些并不存在的法律,你说这是不是很不正常啊”。另一方面,他在身体行动上有所保留地施加领域性影响力,调查、分析、追踪暴力犯罪,及时警告摩斯妻子家人所面临的危险但并未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贝尔沿着自我延续的路径建构老年身份,在精神维度固守西部传统价值,在身体实践表现适度的退却,个体经验的二元悖论形成资本逻辑空间里的反讽式隐喻。

三 领域关系的身份权威

罗伯特·萨克在提出领域性定义的基础上,又细分出十条属性补充深化领域性的内涵,从本

质而言,“领域性并非客观实物而是一种关系”,“领域性是经由交往后行为的延伸”^③。这两点核心属性说明,领域性首先是一种关系性建构,包括时空关系、社会文化结构及权力关系,关系的运作需要主体与客体经由“交往”(contact)的媒介方能发挥作用。领域性的交往双方,由于主体捍卫与客体侵犯之间深层的政治性,其实质在于异质化边界的对峙、协商、对话。

埃姆斯秉承三代牧师家族的良好传统,一生克己复礼,勤俭向善,追求精神充实和伦理完满。他的人生也遭遇百般坎坷,年轻时丧妻丧女孑然一身孤独生活,困惑于在种族问题上祖父的好战与父亲倡导和平的不同实践策略,所幸古稀之年得以再次成家并喜获麟儿。罗宾逊的日常生活叙事创造时间静谧的审美效果,这其中不乏深刻的意识形态暗潮——领域维护和关系互动。埃姆斯一生在基列度过,生活与行动主要局限于基列,并于此形成相应的领域范围。罗宾逊笔下50年代的中西部小镇,处于保守且传统的前现代期,充满着詹姆斯·伍德所言的罗宾逊式的“宗教狂喜”^④与自由主义混杂的气息。埃姆斯的牧师身份无疑处于基列社会结构的权威地位掌握着话语权,认同维护着“白人、男性、基督教,资本主义”^⑤与主流精英文化一致的领域内文化价值观。

埃姆斯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家庭层面,其次是与好友鲍顿牧师家的交往。埃姆斯与年轻妻子于一次教堂邂逅结下情缘,罗宾逊基列三部曲系列小说的第三部《莱拉》(Lila, 2014),即以埃姆斯妻子为主要人物展开叙事,彰显女性自我意识的莱拉在《基列家书》中尚且属于一个附属化的存在,埃姆斯对其关爱有加,在平等尊重基础之上隐含着男权化的领域管理。埃姆斯家园领域性焦虑主要来源于与鲍顿小儿子杰克的交往。

杰克从小顽劣成性,犯错不断,成年后又引诱抛弃贫穷人家女儿,离家出走。在外数年后莫名

①Edward S C. *Getting Back into Place*. Indianapoli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8-49.

②Gerben J W. "Age Identity", In Deborah S C, etc., eds. *Encyclopedia of the Life Course and Human Development, Volume 3*,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9, p. 12.

③Robert D S. "Human Territoriality: A Theor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3(1), p. 56.

④詹姆斯·伍德:《私货》,冯晓初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

⑤Susan P. "Field of Deferred Dreams; Baseball and Historical Amnesia in Marilynne Robinson's *Gilead and Home*", *MELUS*, 2012(4), p. 119.

归家,据称有一段跨种族的婚姻并产下一子。杰克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受信奉东部精英价值的父权制话语的权力控制^①,成年后始终游离于各种文化共同体之外,与不同个体及人群进行边界交往。对于埃姆斯来说,杰克的归家是以入侵者的身份侵犯他的领域,“他不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要警惕他”。老年身份的时间焦虑,身体行动力的退化,主观层面自我年轻化的竞争意识,以及价值体系的异质性碰撞,在埃姆斯与杰克的交往中表现为明显的领域冲突,“当我站在讲坛上看着坐在下面的你们仨,觉得你们就像一家人,年轻、漂亮。我那颗苍老、邪恶的心从胸中升起”。埃姆斯坦承最怕的事情是“死亡”,而这种恐惧的核心不在于自身肉体的消隐而是家园领域受到侵犯,“是害怕丢下妻子和孩子,被一个人品极差的人摆布”,极端矛盾于杰克虽“终有一死”,但却会在埃姆斯肉身消隐后“永存于世的存在”。

苏珊·佩蒂特的研究着眼于《基列家书》的棒球运动,认为小说中它以社会性建构包容或是排斥个体。棒球的主流文化意象在小说中被再现为标准化的边界场域,以此测试、规训、支配或是驱逐、区隔异质客体。杰克怀着救赎与和解的善念回到基列,通过棒球运动与埃姆斯一家进行交往,旨在表达接受规训的意愿,杰克年轻活跃的行动力却无意挑战了埃姆斯的领域维护。埃姆斯非常了解自我身份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尤其是老年身份的权威感,“所谓长寿在他身上忠实地保留了所有瑕疵与伤痕;他们所有的主张、所有的癖好都得到人们的尊重”。埃姆斯坚信上帝施予信众无私“恩惠”的基础来源于“宿命论”,信仰的两面性在埃姆斯世俗欲望的驱使下,对杰克进行边界性归类并实施权力压制。对于杰克请教“宿命论”的毕恭毕敬,埃姆斯认为他始终“缺乏善意”,“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智慧对付约翰·埃姆斯·鲍顿”,即中间名以埃姆斯命名的杰克。埃姆斯也常常自我反省,“我闭上眼睛,又看见杰克·鲍顿。在我看来他未老先衰。我想,为什么我总是为了保护自己 and 这个‘衰老’的年轻人作对呢?我怕他带来什么损害呢”。主流评论所阐释的埃姆斯完美人格塑造无疑基于白人精英化立场,他的权威身份带有强烈的征服性与领域排斥力,在

罗宾逊日常叙事的表征下流动着家-国同构的政治色彩。

四 行动退却的精神固守

在领域关系性处理上,埃姆斯的老年身份延续旧西部青年神话的征服性,维护权力结构的主体与价值判断,维护保守型社会秩序与伦理规则,以此诠释老年身份的自我延续内涵。警长贝尔与杀手齐格的交往关系,则以新常态权力生产的方式展现旧秩序的权力颠覆。

赏金杀手反伦理、非理性的行事动机在齐格的行为方式上表现出机械化的绝对理性。齐格利用技术手段定位目标的位置,在时间效率上如钟表般精准。找到目标后他从不急于下手,必定遵循如下的执行程序:读秒精确计算进入房间的时间、用散弹枪撞开锁芯、拉开冰箱喝饮料、留意各种声响、观望等待对象或是与对象聊天、迫使牺牲者掷硬币决定生死、一枪毙命。齐格从不根据情境的变化而改变杀人程序,这种暴力手段彰显其全域化的强烈控制力,执行程序从个体微观层面反映权力的策略、算计、运作,催生新一轮的权力再生产和秩序的建立。作为齐格的杀戮对象,一旦被选定绝无逃脱的可能,齐格喜好与被杀者玩硬币定生死的游戏,以上帝的姿态宣告“宿命论”的终审判决。埃姆斯所崇尚的“宿命论”基于原罪观与伦理救赎的肯定意义,然而齐格的反人性解构了传统西部英雄的伦理内涵。

从感性层面而言,齐格的身体经验完全脱离了人性的本质而退化为执行命令的机器装置。他以技术理性处理人类的身体,将之改造为酷刑展品用于权力规训,同时也将自我的身体进行酷刑仪式处理。他在枪战中受重伤,“腿又黑又紫,而且肿得很厉害”,“伤口大的足以塞进大拇指”,他大费周折处理完伤口,“除了额头上渗出少量汗珠,几乎没有别的迹象表明刚才的活使他费了多大力气”。齐格的身体感知失去了人性的感觉,只剩下机器般的空壳框架。在冷酷杀害摩斯妻子之后,他遭遇车祸,胳膊“骨头刺穿皮肤”,“鲜血不停地流入他的眼睛”,“感觉不到疼痛”。齐格的身体在惩罚的仪式中也自我内化为展示品,在旁观者的“尖叫声”中颠覆现有的秩序重建权力

^①胡碧媛:《边界交往与认同路线:〈家园〉的文化叙事动力》,《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结构。

警长贝尔与杀手齐格的角色定位,在现实语境中进行了置换:齐格游弋于贝尔的领域,以无序和暴力建构秩序与规则,施加权力的控制与影响力。贝尔在一路追踪的过程中,时时面对齐格的规训仪式却从未与齐格发生面对面的交往关系。按照萨克的观点,领域性实践往往遵循“分类、交流、实施”^①的递进流程,埃姆斯与杰克之间,因杰克的返家侵入埃姆斯的家园领域而展开对峙,“分类”的起点具有明显的地域界限和权力归属意义。他们借由频繁的实体化交往而进行领域维护或是权力宣誓,这种领域性的描摹书写具有明确的界定性。反之,齐格与贝尔之间的领域区隔更为广泛而模糊,其物理边界的意义更隐匿上升化为西南部的政治机制,交流的方式和实施手段不局限于将身体实践作为直接作用对象,更将灵魂与精神空间作为改造中心。这种实施和改造不仅针对领域性直接涉及的他者,如贝尔,更以其强大的蔓延性与渗透力震慑、威吓、控制潜在的他

者,从而建构新常态。这种精神控制样态的政治内涵是不言而喻的,在麦卡锡看来,现实化的行动主义已经失却了后现代西部空间的支配效应,贝尔选择退休,以实践的“撤退”和主体的不合作反抗权力的灵魂改造,如老年研究的撤退理论指出的,老年主体可以借此关注自身,“以退为进,完善自我”^②。

结语

作为当代美国西部文学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家,麦卡锡与罗宾逊均在新世纪伊始以老年书写聚焦西部地域的文化历史在现当代的延续与发展。他们审慎观察身份政治中的老年模态,从人性的变迁观照现代进程中西部文化当代内涵,在精神层面寻求西部复兴的文化策略和意义支点,表达“美国西部可以更好地理解为大历史的产物,深受跨国及全球性现代文化的影响”的现实意义,绘制新世纪美国西部文学景观^③。

Age Identi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Spirit in *No Country for Old Man and Gilead*

HU Bi-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Both Cormac McCarthy and Marilynne Robinson published fictions concerning age identity, *No Country for Old man* and *Gilead* respectively, at the turn of the new century. The former critiques the de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values by capital logic, while the latter focuses on a construction of territoriality by power discourse. However, both of them writes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the aging as a technique to go beyond western myth of the young and to reconstruct western spirit with an identity mode of the elderly rooted in a persistence in conservatism and traditional values.

Key words: Cormac McCarthy; Marilynne Robinson; *No Country for Old man*; *Gilead*; age identity

(责任校对 游星雅)

①Robert DS. “Human Territoriality: A Theor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3(1), p. 58.

②朴玉:《论菲利普·罗斯〈鬼退场〉中的老年人自我发现之旅》,《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③Susan K. “The Global West; Temporality, Spatial Politics, and Literary Production”, In Nicolas S. W., ed. *A Companion of th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the American West*. Willey-Blackwell, 2011, p. 515.